

水浒新议

重 庆 出 版 社

水 | 浒 | 新 | 议 |

欧阳健 萧相恺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封面设计：周立伟

水 浒 新 议

欧阳健 萧相恺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 102 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南 充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4 字数322千
1983 年 1 月第一版 198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0

书号：10114·26

定价：1.41 元

序

刘 冬

作者欧阳健同志，是依靠自己的艰难努力，自学而成家的。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他曾蒙冤入狱数载，困苦异常，际遇坎坷。但曲折的经历没有使他心灰气馁，反而更加磨炼了他的意志。平反以后，在短短的三、四年内，他与萧相恺同志合作，连续写出有关《水浒》的论文近三十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他论《水浒》，受鲁迅先生论著的启迪，由此生发开去，从梁山英雄们的身世经历，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水浒》的形成史，从《水浒》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诸多方面，论证了《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其深度、其说服力、其成就，读者皆自可见，无庸赘言。至于《水浒》的研究界是否会同意其观点，那是另一问题。我想这不会影响其学术理论之价值。真理只有在辩论中，通过“百家争鸣”，才能愈辨愈明。对《水浒》的研究尤其如此。在“四人帮”横行时，《水浒》曾被定为“宣传投降主义”的黑书，流毒至今也没有真正肃清；对《水浒》研究的百家争鸣局面，迄今尚未真正形成，至少气氛还不够浓烈，它的研究高潮尚未来临。在这种客观情况下，说那一家的论点最接近于真理，

都还为时太早。

以我个人而论，对于欧阳健同志以“为市民写心”说为中心思想研究《水浒》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因为它说明了许多前人与他人未曾说明、甚至未曾想到的问题，确可称为“新议”；它从一个方面比较透彻地阐发了《水浒》的部分本质。但是对由此得出的《水浒》不是写“农民战争”的结论，我则不敢苟同，至少是现在还不敢苟同。我以为A是B，不等于非C。说《水浒》是为市民写心，不等于《水浒》不是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说《水浒》是为市民写心，是指《水浒》的著述者（不管是单数是复数）的主观意识状态而言；说《水浒》是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是指《水浒》一书所取题材与内容而言。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证明梁山英雄首领们的出身绝大多数并非农民，大多数精彩章节都是写的市民生活而对农村的生活情况较为隔膜，没有反映农民利益的明确纲领等等，但是仍然否定不了这一根本事实：当这些英雄在梁山会齐的时候，是一个武装集团，而这个武装集团是对大地主豪强恶霸武装作战的，是和封建政府的“官兵”——反革命武装作战的；它在根本立场上是代表着农民的利益，至于是否有明确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纲领，那只是测定其自觉程度的标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过无数次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民战争，自觉的程度也各各不同，现在无需也难于定出符合那些条件，才承认它是够格的“农民战争”；或者说某一小说反映农民战争的真实究竟达于怎样的程度，才够格称得上是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

所以从理论角度看来，我以为不妨这样来表述：《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反映市民心灵、目光、经验与想像的农民战争小说。

还必须强调指出：从大体上、从本质上看，在那个时代市民阶

级的思想，是最先进的思想，代表着未来的思想。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自南宋及于元代二百余年间的瓦舍艺人，固然为《水浒》的出现准备了充分的基础，但是它最后的完成者毕竟是施耐庵。《水浒》之所以能够作为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出现于文坛，影响以后各种样式的杰出的长篇小说的出世，与施耐庵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位伟大的封建秩序的叛逆和革命的思想家对瓦舍艺人们的初级成果加以鉴别、过滤、连缀、加工、发展和再创造，《水浒》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水浒》不仅是为市民写心，而且还写了漫漫黑夜的封建社会中一个最先进、最热诚的知识分子的心。

然而，不管我们对这本论文集中的观点有几许保留，仍然不能低估它在《水浒》研究——“《水浒》学”中的重要意义。只要我们粗略地检视一下《水浒》研究的现状和应当达到的目标之间的距离，它的意义便自然地显示出来了。

当前《水浒》研究的现状似可归纳如下：

1. 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的考证，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特别是经过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年的研究、争论，加上新资料的陆续发现，直到去年底发现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的墓志铭，才得以初步做出结论：根据施耐庵的生活年代和生平概略，他确为《水浒》一书的作者。但是有关他生活经历的许多细节，仍待继续探考。

2. 《水浒》的诞生前史究竟是怎样的？施耐庵所完成的《水浒》究竟是怎样的规模与面目？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简本与繁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才初见端倪，距离国内学术界共同的大体满意的目标尚远。

3. 产生《水浒》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实际上还刚刚开

始。

4. 关于施耐庵与《水浒》在我国文化史与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还未认真的系统的进行。

5. 关于《水浒》的政治思想内容的探讨，目前争论的问题还多。

6. 关于《水浒》的美学探讨，目前尚未深入展开。

7. 有关《水浒》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现在也刚刚开始。

8. 从《水浒》探讨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规律这一课题才被提出。

9. 关于《水浒》的批评史研究，资料工作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研究也才开头。

10. 关于《水浒》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与对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运动所具有的意义方面，目前还只有零碎的而非系统的研究。

在我们的想象中，以为对于施耐庵与《水浒》的研究，只有在上述十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开展，并取得相应的成果以后，才能算差强人意；才能算对得起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才能算《水浒》研究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尽了初步的责任。

《水浒》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从这本论文集可以窥见其消息。因为它主要的篇幅，还只是上述十项内容的第三项的一个侧面。反过来也可以说，本论文集所表现出的刻苦、严肃、踏实的钻研开拓精神，也为《水浒》研究的有待深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

对施耐庵与《水浒》的研究，要有大步的前进，自然只有依靠研究界与《水浒》爱好者的共同努力。这里，也预祝本文集的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1982.4.5.于南京

目 录

序.....	刘冬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	(1)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22)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二说.....	(45)
《水浒》作者代表什么阶级的思想.....	(73)
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	(83)
柴进·晁盖·宋江论.....	(93)
吴用·三阮·李逵论.....	(111)
杨志·鲁达·武松论.....	(131)
卢俊义·燕青论.....	(152)
高俅论.....	(167)
王庆论.....	(180)
谈《水浒》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193)
《水浒》情节结构刍议.....	(206)

宋江与梁山泊关系新考·····	(223)
从历史原型到艺术典型	
——宋江形象的市民化·····	(235)
《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	(254)
吴从先《读水浒传论》评析·····	(288)
从武松形象的衍变看扬州评话对《水浒》的继	
承和发展·····	(305)
《水浒》、《艾凡赫》同异短长论·····	(318)
金圣叹《水浒》评改动机探·····	(340)
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358)
鲁迅是怎样评论《水浒》的? ·····	(373)
贡献与疏误	
——评《水浒五论》·····	(384)
何止多走了一小步·····	
——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	(392)
科学地总结《水浒》研究的遗产·····	(409)
跋·····	(420)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

一 引 言

有一位研究《水浒》的学者曾经感慨地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正因为自己和《水浒》打过一番交道，现在就特别感到《水浒》很难谈。”这番话讲得很中肯。《水浒》这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历来就众说纷纭，歧义迭出。自“四人帮”借评《水浒》大搞阴谋活动，把它引进政治领域之后，更是弄得“禁区”林立，忌讳甚多，给人们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那种情况下，“《水浒》很难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们所设置的“禁区”已开始有所突破。有的同志针对“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水浒》的荒谬做法，从毛主席的著作和言论中举出一些赞扬、肯定《水浒》的话来，力图证明《水浒》基本上是一部“光辉杰作”；然而，这又不能说服另外一些同志，他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关于“反面教材”的谈话，“是指《水浒》总的政治倾向性，这是明白无疑的。”^①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有些怪：一方说《水浒》是“光辉杰作”，一方说《水浒》是“反面教材”，却又都宣称自己的见解“来

自”毛主席的论断。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水浒》，究竟是从《水浒》本身的客观内容出发呢，还是从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某些语录出发？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不能用照搬照抄毛主席的个别论断来代替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重新对《水浒》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它的本质来。

比如，《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的性质是什么？就很值得再作一番研究。我们看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水浒》专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都说它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赞美派说，《水浒》是一部“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否定派说：《水浒》是一部“农民革命叛徒的颂歌”。连“四人帮”一伙，也是把他们那一整套谬论建立在“农民起义”说的基础之上的。不过，他们是别有用心，自当别论。我们至今不能对《水浒》作出科学的解释，关键恐怕就在这个“农民起义”说的不当；《水浒》中所写的梁山泊聚义，从根本上说是不能算农民起义的。

下面分几点来谈。

二 《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 不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

主张《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是农民起义的主要根据是：《水浒》是以历史上确曾有过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种把作为文艺作品的《水浒》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单纯看成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的观点，粗一看来，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它只注意到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水浒》，却忽略了从《水浒》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从而割断了《水浒》与历史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如果我们问：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农民起义是谁？老百姓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梁山泊宋江！

这种对于宋江起义的强烈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知道，关于这次起义的始末，史籍所载，不仅极为简略，且又多相牴牾，致使史学界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宋江起义实际上规模甚小，影响甚微，故不值得在史籍上大书特书。出于北宋史官之手的《宋会要辑稿》，就无关于宋江的直接记载；《宋史》中也仅有几条零星的材料。《侯蒙传》曰：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张叔夜传》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宋朝官兵的战斗力本来就极差，碰到“其才必过人”而又强悍善战的宋江辈，“莫敢撓其锋”，并不值得怪异。“官兵数万无敢抗者”，也许是侯蒙的夸张之词，事实上宋江就曾败于王师心这样一个小小洺阳县尉之手，^②足见宋江只是一支小规模武装力量，有人估计，他们即使不止三十六人，“但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人，所以张叔夜能够以一千兵收降了他。”^③相比之下，与宋江几乎同时的张迪，聚众数十万；高托山自称有众三十万。宣和七年，招安张万仙等五万余人，贾进等十万人，规模都远比宋江要大得多；更不必说王则、方腊这些在《宋史》中列有专传的农民起义了。

另外，宋、元两代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曾记载宋江占据梁山泊，并以此作根据地之事，只有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曾提到宋江和梁山泊的关系：“余童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嵒嵒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蓂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

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显然，这里说的“相传”，乃一传奇故事，并非历史事实。故清人袁枚说：“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④

问题很清楚：“梁山泊宋江起义”之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变成声名远在黄巢、李闯之上的农民起义，乃是由于《水浒》的功劳。《水浒》的巨大艺术魅力，竟然塑造了人们的历史观念。这种力量，不仅使一般的平民百姓极其熟悉梁山泊的故事，甚至连我们的一些史学家，也把文艺作品当成了历史。比如，有的历史学家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按《水浒传》所说，他们起义的根据地是梁山泊，地在今山东郛城，宋江亦郛城人；三十六人的出身，有衙门小职员、小军官、渔民、水手、行脚僧、农民、贫民、流氓、小商、下层知识分子、捕头以至地主等等；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打击官府，打击大地主，如林冲等还有一种抗击契丹的要求和思想。这些记载，基本上应有所根据。”⑤连新近出版的蔡美彪等同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也径直把梁山泊当成宋江起义的根据地，并把它同方腊起义并列为北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这些，都是把文艺作品当成历史写进历史著作的典型例子。

可以这样说，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视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念，完全是《水浒》影响的结果。而当我们的文学史家在研究《水浒》的时候，又反过来把那种由《水浒》造成的历史模式套到了《水浒》的头上。于是乎，历史上的宋江是农民起义，《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自然不言而喻是农民起义了。

有人也许会问：不论如何，历史上的宋江，被统治者骂为“盗”，而《水浒》中的宋江，不也同样被骂为“强盗”吗？为什么不是农民起义呢？

诚然，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对农民起义必然是深恶痛绝，百般加以辱骂、诋毁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盗匪”不加区别地一概都看成是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宋江，由于史籍记载简略，许多情况已难以稽考，我们也不妨可以承认它是一支农民起义。但是，对于《水浒》，作品俱在，是完全可以加以分析的。传说中的水浒故事所歌颂的是“盗”，这一点，宋人也是没有怀疑的。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说：

“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顺便提一下，古人对于“盗”、“贼”二字的理解，和今天有所不同，“窃货曰盗”⑥，“毁则曰贼。”⑦为“逆乱”者，一般称“贼”而不称“盗”。以《宋史·徽宗本纪》为例，称方腊为“青溪妖贼”，称宋江为“淮南盗”，是体现了这一区别的。龚圣与称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把他同方腊（方腊起义，自号“圣公”）等“乱臣贼子”相对立，清楚地说明在他眼里，宋江这样的“盗”，并不是“专犯忌讳”的“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宋江“为盗亦是事实”，并把他们的行径概括为“打家劫舍”，这种理解是符合事实的。

总之，文、史毕竟有别。题材和主题也毕竟不能混同。《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不相同的两码事。它的性质如何，只有从对《水浒》的具体剖析中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

三 “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农民

许多《水浒》研究者都曾指出：“官逼民反”这四个字是一部《水浒》的主旨，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水浒》的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在于它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腐败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下层人民的反抗强暴的斗争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在封建社会里，“官”与“民”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民反”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官逼”。《水浒》通过一系列文学形象所概括出来的“逼上梁山”的主题，已经成了鼓舞一切被压迫者走向反抗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水浒》中“官”与“民”的矛盾情况，却必须做具体分析。有人说，水浒产生在四五百年前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它所写的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人，当然是地主阶级；而被压迫被剥削者，就是那广大农民了。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然而，却并不是唯一的矛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就长期存留着奴隶的残余；在它的一定阶段中，又出现了市民阶级。同那些奴隶的残余不同，这个市民阶级却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阶级。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者，就不一定“当然”只有农民阶级。

至于《水浒》中塑造出来的被官府逼反的“民”究竟是不是农民？他们是怎样反上梁山的？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水浒》本身的实际内容的剖析才能解决。梁山泊聚义中一百零八人上山的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种情况：逼上梁山的、设计“请”来的、交战归降的。其中设计“请”来者，是出于山寨的某种需要；交战归降者，则是因损兵折将，断绝了归路的。两种情况显然都出于被动无奈，其不是真正的农民，上山之前甚至毫无

革命性可言，是不容置疑的，故可略而不论。唯“逼上梁山”者，一般都看成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斗争，故需仔细分辨一番。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生活在繁华的东京，“每日六市三街，游玩吃酒”，只是由于高衙内倚势欲霸占他的妻子，遭到阴谋陷害，发配沧州，又“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最后被逼上了梁山。林冲的行为，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同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并无内在的联系。“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林冲投奔梁山时赋诗所表明的这种“志”，同农民革命的“志”，并无共同之点。

同林冲相比，做过殿司制使官的杨志，就是另一种类型。他是虽然一再遭受挫折，还是要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直到失陷了生辰纲，无法向主子交差，才不得已上山落草。他的上山，还不好说是统治者“逼”出来的。

晁盖、宋江、柴进等人，在复杂的矛盾纷争之中，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鲁智深、武松等由于抱打不平，无处安身，最后都被逼上了梁山。他们的行为，对于封建秩序是一种冲击，但是，他们都非农民，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

《水浒》中虽然也写到若干出身下层的英雄，但大部分是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无产者。李逵出身于长工家庭，但他本人已经做了狱卒，无论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识，都同真正的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出于对宋江的“义”而跟上梁山去的。三阮是渔民，“亦曾在泊子里兼做私商的勾当”，他们是由于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的快活生活而去冒险的；事成之后，分了钱财，各自归去，并没有因此举起什么“农民革命的大旗”。象解珍解宝兄弟这样因受恶霸地主的诬陷起而反抗的情况，在《水浒》中是极个别的。

如果我们撇开《水浒》所着力塑造的上述几个最主要的典型形象，把视野扩大到所有的反抗者中去，又是什么情况呢？杨志曾对梁中书说过：“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儿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水浒》正面描写的大小山头，有十几处。占据这些山头的草莽英雄，小说大多交代了他们的出身以及“落草”的原因，其中计有打银工人、造船工人、车家、贩羊马的、贩生药的、贩水银货的，等等，再就是流落江湖的游民闲汉，还有个别的落第举子秀才、破产逃亡的地主。只有陶宗旺一人是“庄家田户”出身，小说却偏偏没有写明他为什么要“落草”。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不是。联系到《水浒》中没有封建地主对农民直接压迫剥削的任何描写，甚至很少农村生活的反映，以及《水浒》英雄的活动场所多在城镇，就足以说明，《水浒》作者所熟悉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他所关切和同情的主要是市民阶级的命运和前途，他用浓墨绘出的，主要是市民阶级的爱憎、意愿、反抗和斗争。

然而，如果把《水浒》中的造反英雄仅仅概括为主要是市民阶级的人物，那还不曾抓住《水浒》的本质。《水浒》的实质乃是，它所描绘的所有英雄，是一群豪侠；梁山泊聚义，并不能理解为后世所谓的“市民聚义”或“市民暴动”，它实际上乃是一个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梁山中人，不论出身于何种阶级，经历了何种曲折的道路，但都一律“爱使枪棒”，讲究“义”气，敬仰“仗义疏财”的豪举，推崇“见义勇为”的气概。“侠”，从阶级本质上讲，属于游民无产者的范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他们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⑥综观《水浒》一百